

《世界经济千年统计》,【英】安格斯·麦迪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津报力荐

从地缘政治到政治算术

伍晓鹰

推荐理由:本书是在长期经济增长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计量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姊妹篇,本书是关注如何量化长期增长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

书中包含一百多个表格以及丰富的数据,并对

数据来源和数据计量方法进行了详细和透明的解释,既是对《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料来源的补充、更新和修订,也是其重要的延伸。其翔实的数据资料以及对基础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方法,对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鲜明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津报书架

《寂静的剧场：霍珀画谈》

【美】马克·斯特兰德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

美国普利策诗歌奖得主、桂冠诗人马克·斯特兰德在大家霍珀那里看到一个他似曾相识的世界。“常常感到霍珀画中的那些场景,是我自己过去经历过的”,总是被“抛置”于一个完全由情绪和感觉所主导的虚像空间”,被一股莫名的张力所引导,在画作面前游荡,最后却只见“自己与自己相遇”。因此,他选取了霍珀的三十幅画作,从内容叙述和形式几何学上,以诗人的语言进行解读。“所有那些因霍珀而激发的书写中,没有一部能比马克·斯特兰德这本小书更冷静、更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我们是如何为画作中的形式元素而感动、而惶然的。”美国小说家、诗人约翰·厄普代克说。

《晚春情话》

韩松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本书是韩松落最新中短篇小说集,他以独具西北大地特色的笔触,冷峻地观察、细腻地记录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故事。这些小说中,有“出走的李志亮”,突然之间悄无声息地离开熟悉的一切,走向无人知晓的荒野;有“南下逐梦乐坛的少年”,在20世纪90年代,背负时代流转、命运纠葛的功名成就;有“身陷在桎梏迫切逃离的雷米杨”,他有梦寐以求的美丽新世界,却不知眼前究竟是黄金岁月还是虚幻人间;有“父亲失踪”之后,徘徊在回声、空间、游戏纠葛“谜团”中的儿女们;有拐卖案背后,背井离乡的一林、内疚自责的母亲、假想之中的“救喊白塔”和说不出口的“情话”;有陌生女人脑海里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和肆意拨来的通话……

《欢迎来到房子群岛》

【俄】玛莎·克拉斯诺娃-沙巴耶娃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4年3月

在神秘的大西洋百慕大三角,“蜜蜂”号客轮遭遇风暴,幸存乘客漂流至一片无人知晓之地——房子群岛。在这片土地上有一群奇特的生物,他们建造了很多神奇的房子,包括飞行屋、风之城、子宫的家……人们很快爱上了这里,他们决定留下来,和岛上的生物一起盖房子。这是一本幻想故事加创意手工的大型图画书。读者首先通过故事与插图探索幻境“房子群岛”,之后根据相应的手工教程,建造故事中出现过的神奇房子,完成幻想到实践的过程,从而培养想象力、创造力与建筑思维。只要运用自己的双手,运用身边的小东西,开启无尽的想象力,就可以建造这些存在于幻想中的房子。

和处理地缘政治关系时的成本意识,从而使经济理性成为确立国际秩序时的重要因素。麦迪森认为这始于17世纪中叶由配第所开创的政治算术学。配第和其他政治算术学的前驱者们勇敢地接受了17世纪科学革命对人类认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逻辑能力的挑战。随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政治算术学不仅推动了以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为目标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制度,以及国际秩序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计量工具。

● 地缘政治危机与政治算术学的出现

所谓地缘政治,如我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导言中所阐述的,是指地理上相邻或相关国家之间基本上由经济利益所左右的关系。由于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当其中某个重要因素的变化打破了既有均衡,使相对经济成本发生重大变化,而有关各方无法接受因此可能导致的经济利益进而政治权力必须被重新分配时,就可能酿成不诉诸武力就无法解决的危机。在重商主义时代,解决地缘政治危机主要依靠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哪个国家或势力集团在危机中胜出,对峙的各方都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与财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危机从来都是对参与国的公共资源动员能力或税收能力的严格考验。这样,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公共资源的问题就自然将各国政府引向了对本国的税源,即财富创造能力的关心。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地缘政治危机中胜出也促使各国政府必须关心其对立国的财富创造能力。正是这样的动机刺激了本国生产情况测算、国际收入比较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出现。借用配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界定,麦迪森认为这些通过数字及其所建立的经济逻辑关系去评价和论证政府事务的艺术可以被统称为政治算术学(political arithmetic),它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用以观察整体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测算的前身。

开政治算术学先河的威廉·配第,是以《赋税论》(1662)为题,从比较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税收问题开始他的国民收入研究的。1665年,在《献给英明人士》中,他进一步改进了方法,更系统地就人口、收入、支出、土地存量、其他实物和人力资源的存量等方面对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了比较,其目的实际上是为正在进行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提供一个基于资源动员有效性评估的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的定量分析框架。英荷战争,包括牵扯其中的法国、西班牙等对荷兰的战争,本质上都是重商主义之战。直接起因是在英国在1651年颁布了

旨在保护其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英国在由此引起的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中险胜荷兰,然而却在随后因进一步强化其利益的《航海法案》修订所引起的两次英荷战争中都失败了。饶有意味的是,配第的研究工作几乎与英荷战争同步,而且在关注英国的同时,也转向了对法国和荷兰经济的比较工作,从两国的效率表现引申到制度问题。他的结论是法国的效率远不如荷兰。其后来得到亚当·斯密和道格拉斯·诺斯高度评价的《政治算术》成稿于1676年,当时整个英国还处在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失败的沮丧气氛之中。

● “政治算术”与“生命算术”

“政治算术”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深刻意义应该始于“生命算术”。不难推理,原始的算术来自与人类生存需要进而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对食物的“计数”需要。它的产生是生命驱动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因为对有限且供给极不确定的食物的分配和管理从来都是生命攸关的。逐渐地,一些简单的,或许可以被称为“生命算术”的计算规则产生了。完全可以理解,对一个原始的利益共同体来说,这种“生命算术”必须是利益中性的,否则就会导致整个共同体的崩溃。这种利益中性条件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对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府统计数据以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算术”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它源于生命内在动力的对剩余的不断追求,不断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也与由原始的“生命算术”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密不可分。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剩余,其结果是既刺激了市场交易的扩大,也鼓励了通过权力对剩余的争夺和各种方式的不平等占有。最终,还是“生命算术”式的理性,迫使重商主义“丛林法则”下的各方势力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妥协了。

在重读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基础上,我曾试图提炼出这样的命题,即地缘政治危机促进了制度改进,进而推动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基础的收入与财富的增长(见《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导言)。在这篇随笔中,通过梳理先生关于宏观经济测算史发展脉络的讨论,我进一步延伸了上述假设,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命题,那就是,基于数量逻辑的“政治算术”,在解析生产、收入和支出的经济逻辑以服务于本国政治需要的同时,也支持了人类旨在克服地缘政治危机的、有利于收入与财富增长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建设。这样就可以把“政治算术”嵌入一个“地缘政治—制度建设—长期增长”的逻辑框架中,既作为其不可或缺或计量的基础,又符合其源自生命的自然演化逻辑。

● 地缘政治与“政治算术”的未来

今天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不断加速,同时地理障碍日趋消失,但地缘政治关系却日趋复杂的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几乎每天都在各个领域推进着技术前沿,挑战着昨日的可能性。这迫使投资者不断地改变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不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方向上,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会强化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必然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君不见,政治可能“诱惑”或利用技术,技术亦可能“绑架”政治?从这个角度看,以麦迪森量化观察的人类千年经济增长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来得益于“自由贸易”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为鉴,一个旨在改善地缘政治关系,维护和促进自由与公平交易及交流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政治算术”的重要性不会消失。然而,作为公共产品的各国政府统计数据是否可以保证利益中性,取决于以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是否可以推进,这也是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政府GDP数据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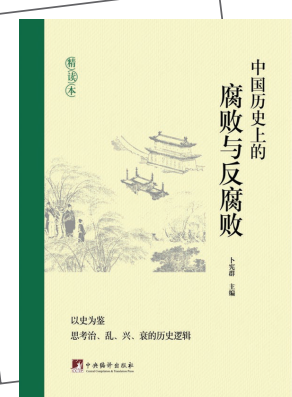
“政治算术”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经济理性力量所驱动的自然演化过程使然。这种理性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让不同族群、集团和国家不得不权衡成本与利益,放弃消耗生命与财富的厮杀,回到以规则和合约为基础的、竞争性的经济和政治交流上来,维护一个共同遵守、共治理、共享和共赢的国际秩序。尽管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和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在造成新的利益冲突,甚至可能极端至核武大国之间的直接对峙,也很难想象这种理性的力量会消失。诚然,变化总是会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避免冲突,国家之间必须采取妥协的态度。妥协促进学习和交流,战争导致防备和封闭。而后者会进一步扩大那些引起利益变化的差距。

恰恰是退让、妥协、合约,以及尊重原则基础上的履约,而不是战争——不是利益问题上的动辄穷兵黩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样说,显然是与长期以来颇有影响力的所谓“战争创造历史”的主流观点相反的。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妥协的精神就是市场的精神,或者说满足各方利益的交换精神。妥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最终,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才使知识和财富得以积累,才使创新有了可预期的商业基础。也正是因为妥协于各方利益的重要性,我们才需要严格的约束规则,才需要准确的计算。所以,“政治算术”,不管以什么形式,仍然还会存在。可以预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会改善国民账户的算法,杜绝数据造假,但其政治性不会被削弱。

分享悦读

摘自《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精读本)》,卜宪群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产生途径



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对被统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大家所熟悉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言论,就是“民本”思想触动统治阶级政治神经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一。

三代的刑律对贪贿已有严格的规定。《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杜预注曰:“墨,不洁之称。”据此,不晚于夏代,对贪的惩罚似乎已有了正式的刑律。商代针对贵族官僚管理的条规刑律则更多。如《尚书·盘庚中》记载盘庚对“具乃贝玉”,即聚敛钱财的大臣予以严厉的谴责,并要以严厉的刑罚处置他们。相传作于西周穆王时的《吕刑》中有所谓“五过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大意是指官吏办事不公、贪赃受贿,执法者要秉公处理。三代对贪贿的惩处是否都出自“民本”思想的价值观念,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但以条规刑律对贪加以惩戒,这是在以往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实际上,三代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地区只限于“王畿”,官僚的选拔任用主要依据的是血缘而非才能,分封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使中央对地方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这样的社会结构及其所决定的政体形式,使廉政制度的建设只能停

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也决定了当时廉政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限制。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各国王权在摆脱了周天子的控制后日益加强,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郡县乡里制开始产生,世卿世禄的贵族制逐步让位于君主任命的官僚制。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出于强国的需要,也为了管理多层次并且逐渐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需要,廉政建设的迫切性摆在了各国统治者面前。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多姿多彩。齐相晏婴云:“廉者,政之本也。”晏婴还与齐景公专门讨论过廉政问题。一次,景公问晏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婴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

其浊无不弃,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的话含义很深刻,意思是廉政能否持久,关键在于各级官吏能否做到坚守美德,出污泥而不染,做廉洁的表率。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几乎无不涉及廉政文化这个重大问题,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例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这个时期廉政文化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数法家的廉政文化学说。法家从人具有贪欲的天性出发,既主张从制度上设官分职,加强监督,防止腐败的产生,也主张从道德的层面面对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级官僚进行教育。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货财也。所谓直者,义必正,公心不偏党也。”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他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法家的廉政文化思想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不仅春秋战国之际列国的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的廉政行为的深层次价值观念在法家思想中都可以寻到踪迹,而且整个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也都无法回避法家所奠定的基础。

谈到廉政文化的建设不能不说到《周礼》这部书。大约成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并不是一部关于周代官制的专著,而是主要反映战国时代的制度并掺杂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此书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上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源远流长的古代廉政思想和当时风起云涌的廉政措施作了深入的内涵分析和典型概括。在《周礼·天官·小宰》中,作者说:“(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指要用这“六廉”的方法来考核官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六种考核手段之前,作者都加上了“廉”字,显然

是将“廉”从狭义的范畴抽象出来,赋予其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后来的经学家总结出这“六廉”是“以廉为本”。“以廉为本”的“六廉”观是一个卓识,全面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思想家对官僚队伍廉政素质的要求。如果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廉政行为和廉政思想的深层次结构之一,那么以上的“六廉”观就大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核。中国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与完善的。

廉政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反之,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演进也促进着廉政文化的繁荣与革新,但是决定廉政文化形态的根本因素则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一般来说,只要有公共权力的设立,贪与廉、勤与惰的对立观念,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就必然产生。这在任何国家大概都不例外,但问题是各个国家、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廉政建设道路往往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廉政文化的社会基础不同。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彻底解体的情况下进入国家状态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农村公社和家族公社的顽强存在,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以“族”的形式实现的。松散的邦国联合体和“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是三代国家结构的主体,官僚的选拔采取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制。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程度很低,国家的官僚往往就是“族”的首领。因此,廉政建设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廉政文化的表现形态还只是停留在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对腐败贪贿者的指责以及简单的刑律处罚上。井田制瓦解后的春秋战国之际,基层社会由血缘式的族聚结构向个体小农,对整个社会直接控制的郡县制和官僚制的建立,对廉政建设成为自上君主下至庶民都十分关注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由此才变得丰富多彩。

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的。没有相应的政治和廉政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廉政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廉政文化的产生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即使研究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也要注意它的特定含义,不能作简单的解释和比较。这种差异和区别意味着,廉政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产生时间很早。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为政“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这里面就包括了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含义。《尚书·皋陶谟》中提出的所谓“九德”,也主要是针对为官者的素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念,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

在这个时期,“贪”和“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也已出现。史云黄帝时“缙云(一种官名)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这与轩辕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的为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皋陶谟》中提出的“简而廉”的“廉约”观念截然不同。对贪贿的指责与对廉、勤的赞叹是早期廉政文化最淳朴的形态。当然,这些都是后世文献的追忆,还不能说完全是当时历史的实录,不过把它们看成我们祖先在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夜就已经拥有的廉政文化智慧大体是不错的。我们的祖先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了阶级社会。

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